

沟通中西文化的引路人

——容闳和他的“教育计划”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教育救国”是他毕生的目标，但在黑暗、腐朽的清廷统治下，这个强国兴邦的梦想必然破灭。尽管如此，也并不能抹杀容闳作为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对“开文明新哇，扬文明新风”的历史功绩。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懂事起，他就看到离南屏村几里远的澳门被殖民主义列强侵占，伶仃洋里难以数清的英美鸦片商船千帆波动，传教士纷纷钻入内地进行文化侵略。而清王朝统治基础正在崩溃，统治日趋腐朽没落。在这种特殊社会状况下成长的容闳，摒弃了祖辈一直奉举的“科举”道路。幼年时，父母送他到澳门英国人古特拉富夫人创办的教会小学读书，受西方殖民文化教育。后来学校停办，他又返回故乡。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容闳的父亲与世辞别，从此全家生活更加贫困艰难。没有办法，容闳就跟着姐姐弄点香烟小吃，提篮沿街叫卖；收了庄稼就到地里捡收麦穗，过着形如乞丐的生活。

后来，在一个好心邻居的帮助下，容闳进入澳门一家教会办的印刷厂当徒工，后又到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家打下手。1841年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到香港礼逊教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开设了英文、算术、地理等几门课，还非常注重西方文化的教育，容易使学生形成西方优于中国的思想。他尤其崇拜主持该校校务的美国

传教士勃郎先生，并向往美国的社会生活。1847年勃郎因病准备回国，要带几名中国学生，容闳激动地举起他的小手。于是容闳等就在1月4日随传教士飘洋过海，直趋美国。

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处在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工业、农业飞速发展，新兴城市大量涌现，西部开发热火朝天……这些都给容闳的思想烙下深深的印迹。到美国后他先在孟森中学读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容闳面对两大难题，一是学习上的难关，一是解决上学费用问题，但他都靠自己坚强的毅力克服了。1854年，26岁的容闳以优秀学业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容闳一方面受美国思想的影响，使他自然地崇拜“西方文明”；一方面仍挂记着祖国，他没有忘记南屏村的山山水水和自己沿街叫卖的流浪岁月以及农民们的贫苦生活和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这两种景象和观念共同作用，形成了他“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思想和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教育计划”。这种以“教育救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的提出，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容闳不仅是这种政治观点的首创者，也是第一个实践者。

1854年11月，容闳毅然放弃在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计划，扬帆回国。但现实未尽如意，中国虽经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呼吁呐喊，仍依旧闭关自守，风气未开；大多数清朝官僚仍然夜郎自大，抱守孔孟伦常，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至于派人出国求学，崇拜洋人更认为大逆不道。这样，容闳从1855年到1863年的八年间到处碰壁，“教育计划”一纸空文揣在身上无法实施，他一无官吏作靠山，二无雄厚的财力，简直有点绝望了。

这时，曾国藩的一个幕僚写信给容闳，说曾想让容闳到安庆与他相见。于是容闳有如久旱逢甘露一般，赶赴安庆，希望通过曾国藩这位清庭红人来实施他的教育计划。当曾国藩说想在上海建兵工厂，兴办军事工业而没有合适人选到国外采购机器设备，

想让容闳跑一趟时，容闳感到有点失望。但他又想，不妨先取得曾的欢心和信任，伺机再争取他同意施行“教育计划”也未尝不可。于是不辞劳苦，赶赴美国，很快买回机器，江南制造总局很快开业。这件事使曾国藩充分信任了容闳的学识。当1867年容闳建议曾在制造总局旁边设立兵工学校时，曾欣然同意。这所学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科技人材。容闳很兴奋，他在回忆中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于是，容闳大胆拿出了他怀揣已久的派留美学生出洋深造的“教育计划”。

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庭上了个陈条，计有四条建议，中心内容是派遣留学生的第二项，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递派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令，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在奏折中，容闳甚至把派遣留学生的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设想到了，完全切实可行。但由于转奏者回了老家，条陈如石沉大海。容闳没有气馁，1870年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涉外案件（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同行，他几次鼓动了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国藩终于同意了容闳的主张，并答应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朝廷。由于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清政府急须一批和侵略者打交道的外交人员，再加上曾国藩、李鸿章办外交和办工厂实业等洋务事业的需要，因此在1870年冬天，清廷批准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奏折。随后曾、李着手制定了选派留学生出国的十三条章程，并在上海设管理局，任命刘翰清负责沪局派留学生一切事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留学生正副监督。

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是派遣留学生的产婆，而容闳作为留学动议的始作俑者则起着“助产”的作用。1872年夏，第一批留学幼童选毕，8月17日起航赴美。留学生到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友

好人士的热情接待。由于年令小，又初次外出，留学幼童处处都需要照顾，加上条件限制，留学生需全部寄宿民室。但美国友人不怕麻烦，热情欢迎，把给留学生寄居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对留学生无微不至地照顾。1874年，在容闳的主持下，一座三层楼房在哈特福德城的克林街树立起来，作为留学生事务所，条件大为改善。在美国友人的照料和容闳的教导下，留学生学习刻苦，孜孜不倦，几年功夫，不少人就升入美国中等专科学校，有的甚至考入耶鲁大学土木铁路工程专业，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

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和好学，却引起清朝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派留学生是为了使他们成为略通西方知识的忠君亲上的封建奴才，而非精通西方文化的清廷的掘墓人。因此派出正监督陈兰彬这样的顽固守旧分子来把此“关”。他对留学生穿西服，参加体育活动，和美国人交朋友都视为大逆不道，多次严厉斥责，甚至和容闳当面争吵。同时暗中奏报清廷，告发容闳将留学生引入歧途，并要容辞职。清廷不加了解就相信陈兰彬的谎言，调容闳为驻美副公使，意味着不得插手留学生事务。由于容闳一再上书恳求，清廷才允许他代管一些留学生事务，并新派一名由陈兰彬推荐的顽固卑劣之徒吴子登担任留学生监督。

吴子登比陈兰彬更守旧，他不仅扼制学生的天性，还经常与陈兰彬密谋；破坏留学生事业，对留学生和容闳竭尽诬陷之能事，并鼓动陈兰彬上奏，让朝廷撤回留学生。在吴、陈合力攻击下，清廷认为留学生步入歧途，发出上谕，让李鸿章、陈兰彬查办此事。李鸿章一面致书容闳，多方指责，一面令吴子登“设法整顿”，吴子登正好为所欲为，对留学生百般教训，并遣送10名“活跃分子”回国。1880年吴子登又唆使陈兰彬上奏朝廷，要求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视学生为囚犯。腐朽的清廷完全相信了陈吴的胡言，于1881年下令将留学生全部撤回。容闳和留学生闻讯后，悲愤交加，国际友人和师生员工联名上书清廷，说明真相，伸张正义。但清廷对美国朋友的忠告置若

罔闻。1881年将留学生分三批撤回，容闳毕生奋斗的“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

留学生回国后，受到封建官吏的冷待，一到上海就由水兵“押解”到衙门后院，并派人看守，中秋节都不让探亲访友。分配工作也不考虑所学专业，随便将名单一念各派去所而已。尽管如此，留学生一到工作，就显示出才华出众、知识渊博的非凡能力，连李鸿章也承认，留学生“分配各地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并得出一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实为中华自强之根本”。

历史告诉人们：詹天佑亲自主持设计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邝荣光探测发现了湘潭铁矿，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教育家和铁路、电讯、开矿等方面的专家，还有人为中国海军建设和维护国家主权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有人做过统计，这批留学生中大部分成为国家的军、政、科学、商界的要人和杰出人才。

历史也告诉人们，首批赴美留学生的派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传播起到启蒙作用，揭开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序幕。就在第一批学生留美期间，接连不断有人分赴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留学深造。历史也说明，这些出洋留学者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而且也经过对比，更加深切感到祖国的落后和清廷统治的反动腐朽，从而在精神上从“奴仆”转为“掘墓人”。近代的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从留学生中成长起来的，埋葬清廷的辛亥革命与此关系极大。从这意义来说，容闳的“教育计划”并没有失败，他简直就是革命的火种，祖国兴盛走向文明的开路人。